

皇帝巡幸左
御策軍紀聖

赵海明 / 著

碑帖鉴藏

上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皇帝巡幸左
神策軍紀聖

赵海明 / 著

碑帖鉴藏

上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終幸慶此當治何理耶且方有社
不意可恨汝違當思與就理一
宗祖帝時面同行樂欲數
書云見左帝弱難論時故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碑帖鉴藏 / 赵海明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696-720-1

I. 碑… II. 赵… III. ① 碑帖—鉴赏—中国 ② 碑帖—收藏—中国

IV. K877.424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6341号

碑帖鉴藏

赵海明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装帧设计 / 周周設計局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50.25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720-1

定价: **180.00** 元 (上下册)

序言

Preface

立石树碑在上面镌刻文字用以纪事记功，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历史十分久远。《墨子·非命下》中就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此可知在当时刻石与竹木简牍、缣帛和青铜器物都可用来作为文字的载体。在商代曾发现刻在石器上的文字，但文字很少，极为罕见。战国时期的《石鼓文》、《中山国守丘刻石》和秦始皇时期的《泰山刻石》、《琅玕刻石》等文字数量开始增多，书法更趋精美，此时，古人纪事已从“惟勒鼎彝”逐步渐进到“或记于石”的阶段。

自汉以降，更出现了不少形制各异，功用不同的石刻文字，历经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元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几次碑刻的高峰，至今立石刻碑之风不衰。古代石刻文字多见于碑碣、摩崖、墓志、经幢、塔铭、石经、造像和画像石题记等。其中以碑的形式最为常见，所以后人把不同的石刻文字统称为碑刻，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就有“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的说法。

在古代还有一种石刻文字，是把名人的墨迹，尤其是一些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摹刻于石，专门供研习书法者而用，与碑刻记功纪事的功能不同，古人称之为刻帖。刻帖之风据传在隋唐五代时期就已盛行，现在所能见到最早而又可信的是宋代刻帖。北宋太宗赵灵命大臣王著访购民间所藏历代名家法书，编为十卷，于淳化三年刻成《淳化阁帖》，据说此帖先刻于枣木板，后又刻在石上。以后，公私刻帖成风，自元、明、清直至民国所刻之帖，不计其数，蔚为大观。

在我国收藏、鉴赏和研究碑帖的历史极为悠久。碑帖一般是指收藏传拓之本，即通常所说的拓本。传拓是古代先民复制和传播文字书法的一大发明，“传拓”一词从字义上讲，“传”有相传继续之意，“拓”则是指以纸墨复印石刻上的文字。传拓一词最早出现在《隋书·经籍志》“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一语中。据该书记载，在隋代内府中曾藏有秦始皇《会稽刻石》一卷、东汉《熹平石经》残文三十四卷，这些都是传拓之本，此外隋内府还藏有南朝梁代的拓本。由此可见，传拓技术在公元6世纪时就已出现，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也有的学者认为，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传拓技术，但目前尚无文献记载可征。

我们目前能够见到最早的拓本实物是清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四种唐拓本，即唐欧阳询书《化度寺碑》、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唐柳公权书《金刚经》和无名氏书《佛说大悲陀罗尼经》，除此之外，还有几种唐代拓本传世。我们看到的唐拓本可谓传拓已经十分精美，经过宋元明清拓工在技术上的不断完善、改进和一些学者及书法家的亲自参与，又由于传拓材料纸和墨制造得更加精良，这都使得传拓技艺得以发扬光大。

古代的碑帖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学、古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等学科的宝贵资料，很早就形成了专门的碑帖之学，有关碑帖的著作纷纷问世。碑帖著作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分为考订碑帖源流、鉴别碑帖真伪、著录碑帖存佚、考释碑帖文字、品评碑帖书艺等等，可谓涉及范围广泛，内容庞杂，其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过去碑帖“或藏之内府，或私家所秘”，而今随着书法艺术的繁荣和文物收藏热的升温，已逐步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人们对碑帖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有了新的认识，碑帖也成了收藏者和爱好者钟爱、珍藏的对象，并希望能有新的关于碑帖鉴藏知识的图书问世，以作为碑帖收藏和研究的津筏。

最近余有幸拜读了赵海明先生新近完成的《碑帖鉴藏》一书。书中对古代碑帖的形制和流变、碑帖的传拓技法、碑帖的装潢与保护、碑帖的艺术价值、碑帖的鉴藏知识、碑帖的经济价值与市场情况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论述，其中不乏新的见解，为前人所未发。该书体例完备，

系统性强，内容翔实，图版丰富，是赵海明先生长期对碑帖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赵海明先生曾长期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从事碑帖编目和鉴定工作，后又担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副社长。曾参与《北京图书馆藏石刻拓本汇编》（100卷）、《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10卷）的编撰工作，并主持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的选编与出版，这些书的出版受到了学术界、书法界和收藏者的好评，并获得了各种奖项。赵海明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他在长期潜心于书法的研习和创作中时有所获，因而著述不辍。出版有《石刻叙录·法帖》、《颜楷书法入门》、《印章边款艺术》、《篆刻蒙求——篆刻知识与技法》，还结集出版了他的书法篆刻作品。

应该肯定的是，赵海明先生的新著《碑帖鉴藏》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书，希望能早日付梓面世，以飨有志于研究碑帖和热衷于收藏碑帖者。

是为序。

谷谿

2009年5月于京华



华夏瑰宝 / 001

——石刻的由来与价值



纪功颂德 / 012

——碑碣往事



融自然之美 / 035

—摩崖刻石



传经典文化 / 046

——石经之功



对亡者的纪念 / 059

—墓志



绘画雕刻的奇葩 / 074

——汉画像石与石刻画像



宗教的寄托 / 093

——造像及其浮屠经幢

集书法之大成 / 111

——法帖的价值



鬼斧神工 / 134

—碑帖刻制及其重刻
翻刻伪刻

约定俗成 / 152

——碑帖避讳与碑别字



传统的复印技术 / 161

——摹搨与传拓



古色古香 / 182

——拓本的装潢与保护



去伪存真 / 191

——碑帖鉴藏的意义



循序渐进 / 201

——碑帖鉴别的次序与方法



鉴藏例说 / 218

——唐宋拓本



鉴藏例说 / 250

——明代拓本



鉴藏例说 / 280

——清代拓本



风云变幻 / 306

——碑帖收藏市场与价格

华夏瑰宝 ——石刻的由来与价值

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经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漫长的发展，人们不仅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石质用品，还创造了表达其思想与追求的艺术形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从上古结绳记事，到观夫自然之现象（图 1-1、2），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字，文字又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有了文字，或书于岩壁，或契于甲骨（图 1-3），或著于竹帛，或镂于金石（图 1-4），逐渐地成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其中石刻作为文字的重要载体形式之一，越来越多地充实在人们的生活中，于是出现了摩崖、碑碣、画像石、石阙、石经、墓志、造像、石幢、法帖等不同形式的石刻作品。它既承载着历史文化发展之脉络，又具有翔实的文献价值，同时，又具备很高的艺术欣赏与艺术鉴藏价值。

上古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是原始人类在文字产生之前帮助记忆的方法之一。在远古时期，人类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以群体活动采集野果、围猎野兽为生。其所获得的食物是平均分配，古人便渐渐产生了数量的概念，在捕获一头野兽后，学会用一块石子、一根木条来代表；或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记数。渐渐地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眼中，一个绳结就代表一头野兽，两个绳结代表两头，或者一个大结代表一头大兽，一个小结代表一头小兽。凡此种种，中国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法，史书上早有记载。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 图1-2 庙底沟出土的彩陶瓮中鹤鸟石斧图形

▼ 图1-1 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中的蛙纹





▲ 图1-3 甲骨刻辞及其拓片

金石学

金石学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是以古代金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近似欧洲的铭刻学，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研究对象属零星出土文物或传世品，未经科学发掘；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

叶昌炽与《语石》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生（或二十七年），民国六年（1917）卒。字鞠裳、鞠裳，“奇觚庐”为藏室名。长洲人（江苏苏州）。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侍讲。校勘审定学冠当代。校书之暇，兼访古迹、碑版。著有《语石》等。《语石》共

石刻究竟始于何时，现在无从考证。金石学家朱剑心在《金石学》一书中说：“三代有金而无石，秦汉以下石盛而金衰。”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刻石之风流衍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全国矣。”从上面两人的著述中，可以得出秦汉之际石刻昌盛之定论，然究其起源，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就古代文献记载来看，早在商代就有刻石存在。如《墨子》一书中就曾多次提及“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在史书中，也记载了孔子观石刻而不识之字的逸事。在一次孔子参加的封禅中，与会者看不懂石头上刻的字，向孔子请教，孔子看后说，上面的字他也“不能尽识”。

从石刻发展的角度来讲，“三代有金而无石”的说法似为不妥，不能因为暂无实物流传，就急于擅加定论；只是由于时代久远，原石在秦汉之际，或遭到损坏和埋没，至今没有发现真品传世而已。其实，清季以来古迹文物的不断出土，纠正了历史上很多定论，即为实例。当然，

从现传世的实物来讲，石刻自先秦一直延展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就其文化积累，可谓浩如烟海，其价值之高，早已被誉为“石头之书”，受到人们的珍重与利用。

我们今天所讲的碑帖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碑有狭义和广义两解。从狭义来讲，他是专指石刻种类中的一种；广义来讲，他又是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从金石学的角度来讲，通常是从广义方面来理解。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看来关于碑的含义早已约定俗成了。

关于“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在古代帛为丝织品的总称，所以古人把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图 1-5、6），称之为“帖”；书写在竹、木片上的字迹，称为“简牍”（图 1-7），也可称之为“帖”。造纸术发明后，帛与缣素、纸并用于书札之中，当时人们皆称之为“帖”，这是帖早期的含义。汉以后，帖的含义不断扩展：

其一是唐宋以来，有汇刻历代帝王、名家书迹于木、石之上，称之为“法帖”。

其二是从墨迹上摹写下来的搨本、从石刻上传拓下来的拓本，为方便学习欣赏，装裱成册，亦称之为“帖”。

其三是清末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凡镌刻、手书等一切书法艺术作品，一经影印装帧成册，亦称之为“帖”。

可见从早期书于帛、简、纸的墨迹到现代关于

写四百七十四则，分成十卷。第一卷按顺序讲各个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讲各省以及外国碑刻，第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著名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文字的体例和有关刻石等事项，第七卷按时代讲碑刻的书写者，第八卷按身份讲各类书写者以及书写的各种字体，第九卷讲碑刻文字的各种情况和格式，第十卷讲拓本、装潢、收藏，最后还附有几则石刻以外的铭刻。这种既分类又系统的讲述，至今仍不失为碑刻入门的普及读物。近人柯昌泗撰《语石异同评》，对《语石》多有补正。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著。许慎（约 58 年—约 147 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郾城县）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 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 年）。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了 540 个部首，收字 9353 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 1163 个，共 10516 字。所收文字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归纳总结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汉字“六书”学说。《说文解字》创立了部首，成为后世字典的典范。



▲ 1-4 西周《墙盘》及其拓片



帖的含义是不断扩展的。

故此，按金石学的分类，本书在这里所讲的“碑”，是取其广义的概念，泛指石刻中有文字或图像的石质载体；“帖”则专取其“法帖”（刻帖）这个含义。正所谓，欲知其内容要旨，先明其篇名界定。

在碑帖的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繁荣鼎盛时期。

一是秦汉时期，碑刻作品多为纪功颂德，且内容丰富，以碣石、墓碑、功德碑、摩崖、画像石、石经为主。代表作有秦《泰山刻石》等七刻石、汉《袁安碑》、《袁敞碑》、《裴岑纪功碑》、《武梁祠画像》、《史晨碑》、《西狭颂》、《熹平石经》、《曹全碑》、《张迁碑》等。

二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时间跨度较长，可谓是品类形制繁多，除碑石、摩崖、石经外，还有造像、经幢、墓志、刻帖等。代表作有《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爨宝子碑》、《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张黑女墓志》、《龙藏寺碑》、《九

图1-5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帛书局部

成宫醴泉铭》(欧阳询书)、《伊阙佛龕碑》(褚遂良书)、《圣教序》(集王羲之书)、《李思训碑》(李邕书)、《颜勤礼碑》(颜真卿书)、《神策军碑》《玄秘塔碑》(柳公权书)、《淳化阁帖》、《大观帖》、《绛帖》等。

在两个繁荣兴盛的时期之间,经历了长达二百余年的禁碑时期。东汉建安七年(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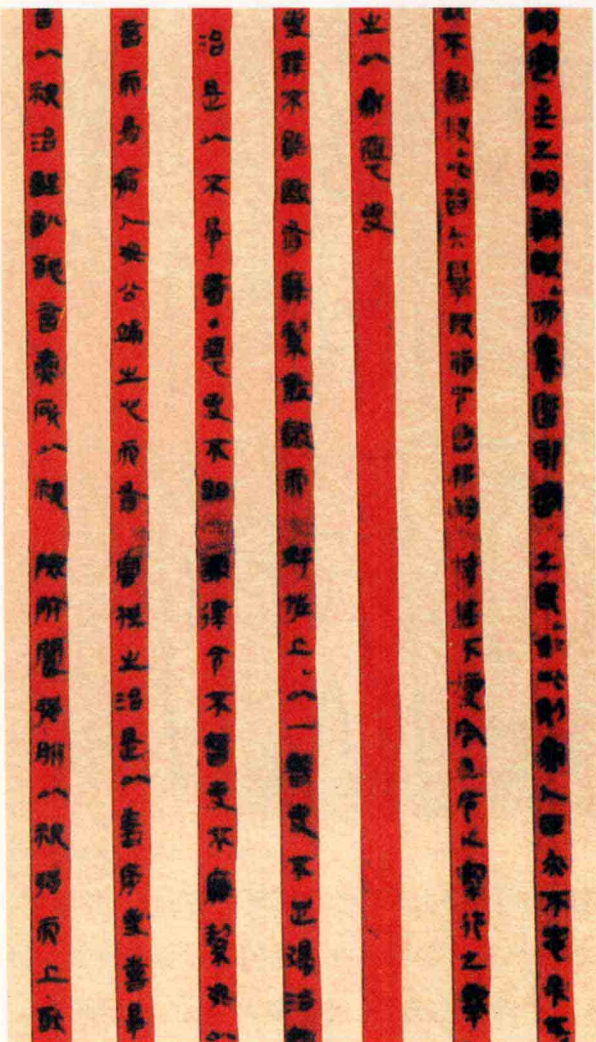
▲ 图1-6 西汉《张掖都尉荣信》

曹操有感多年战事,天下凋敝,民不聊生,为死人立碑,实在是一种奢侈,加之碑文的虚华之词、奉承之风越来越盛,遂下令禁碑。到了西晋,晋武帝更是专此下诏,告知天下:“碑表私美,兴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由于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使碑刻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以至于少有留下有规制的碑刻作品;墓碑由地上转为地下,由此造就了墓志的兴盛。

两宋以后,碑刻本身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随着古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为墨迹流传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碑刻的功用逐步削减了;尤其是书法家参与书碑更是少见,使其艺术价值弱化了。至清末民国时期,现代印刷技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碑刻原有的文献与艺术价值渐被新的载体形式所取代,传统的碑刻可谓走向式微,这也是社会进步发展使然。

那么,碑与帖的区别、价值在哪里?

正如前面对碑帖所作的界定,碑与帖,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分而言



▲ 图1-7 云梦睡虎地秦简

之碑是碑，帖是帖，前人概括为“竖石为碑，横石为帖”，这只是从形制上区别，其实碑与帖的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

一为功用不同。刻碑立石是以期达到“寄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以善书者主其事，书法力求庄重整齐，一般少有署书者姓名的，并非借此传书家之名。相反，刻帖的功用则是以传承、学习与欣赏书法为主要目的，复制历代帝王、名家法书，是人们有意识的书法活动。

二为内容不同。立碑刊刻文字于其上，通常是以记功颂德、追述世系、纪事等为主要内容，其行文是有一定的格式和内容要求的。而帖是以汇集摹刻帝王、名人法书为主要内容，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精者片纸楮素只字皆收。就书写内容而言，多为往来信札与诗文等。

三为书体不同。碑的书体早期皆为庄重肃穆的篆、隶、正（楷）书，及至唐太宗李世民，御笔挥洒，以行书书丹上石，始有行书之碑；草书除唐武则天所书《升仙太子碑》外绝少见之。然而，刻帖尤以小楷及行、草书体居多。

四为形制不同。碑的形制为长方形，竖立于地面；上覆碑额，有圆

顶、方顶和尖顶之分，下有碑趺，有龟趺、方趺之制；碑高者几丈有余，中间或有穿孔，可四面刻字。帖的形制为横石，通常高尺许，只正面刻字，无四面刻字，更无趺、无额、无穿孔，一般镶嵌于壁间。此外，帖有木刻，碑皆无。

五为上石之法不同。碑通常是采取书丹上石；帖则是摹勒上石，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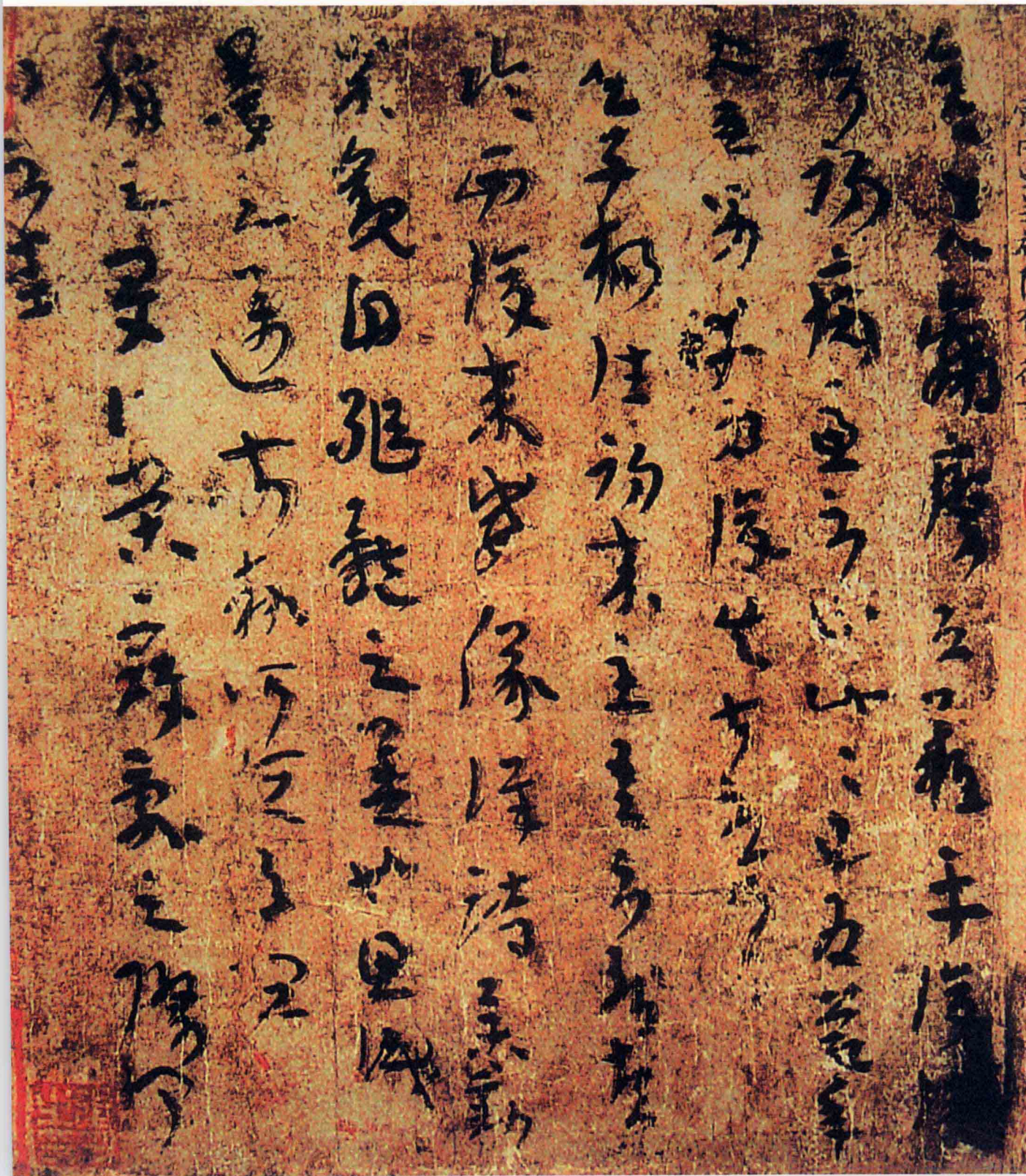
六为刻法不同。碑经过书丹上石，刻工可不完全顾及所写字之笔势，往往因循刀法之便，或与书丹有所出入；有的甚至不需书丹直接奏刀，因而有些碑刻笔画方峻狠直，有刀石之意味，非毛笔所能再现。而法帖经摹搨、勾勒上石后，镌刻时，刻工是不允许有丝毫脱离原作任意奏刀的自由，皆须忠于原作，尽力使之毕肖。摹刻精者与底本对比，几乎完全一致，可谓下真迹一等。

碑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集书法之大成。书法除墨迹外，碑刻为大宗。上自殷商下至近代，书法大者盈尺，如《泰山经石峪》等，小者如豆，如晋唐小楷等，历代名家篆、隶、正、行、草书，各种书体无不涵盖：碑帖可谓书法艺术的最大宝库。

其次是碑帖的文献价值。具体而言：一是校订史实之作用。大凡改朝换代，必修前史，故于本朝不利者皆窜改删除，正史典籍有不尽可信者。然而碑帖之文，皆为当时所作，或埋于地下，或置于荒野，或藏弃旧家，一般不及窜改，皆可用于校订史实。二是具有拾遗补缺之作用。秦汉以降，碑碣与雅颂同文，古文载之，亦不乏鸿文钜制；而刻帖尤多名家诗文词翰，实可补历代文学资料之缺。此外，碑刻中所涉及内容广泛，天文、地理、宗教、祭祀、礼仪、政治、军事、医药、世系传记、风土人情、筑路、立界、造桥等无所不包，可谓是一部万有文库。三是具有文献校勘之作用。文献典籍辗转传抄，或有脱漏谬误之处，可以与石经拓本校之，足可更正补遗。

再次是碑帖传承了不同时期的不同书体，所以具有考辨文字源流之价值。文献记载籀文为最早，然不见原物何以知籀篆之形，而更不知三千余年前甲骨文之为何物？非得碑帖、甲骨实物，方可考文字源流之

▼ 图1-8 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始末。

中国的纸虽然在东汉晚期就已发明,但能够流传下来的最早书写于纸上的文字,现仅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图1-8)。所以石刻上镌刻的两汉、魏晋的文字,无论是文献价值,还是艺术价值,就显得至珍宝贵了。

碑帖自问世以来,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尤其是隋唐以降,至明清之际,更是推崇至极。金石之学昌盛,不断出土的金石实物,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资料,为书法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客观条件,同时,也造就了不少书法大家。晚清最杰出的书法家吴昌硕,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取法先秦《石鼓文》(图1-9),拓展了《石鼓文》左右上下参差取势的特点,在整齐中求工稳,简化中求变化。并将《石鼓文》略扁或略方呈横向的形态,一变横为纵,上密下疏。吴昌硕临写石鼓文的作品流传较多,其中有真有假,历年拍卖会都能见到,其写的最精的现藏于故宫。他在临摹《石鼓文》的同时,还刻意将秦篆、封泥、玺印的各种篆法融入其间,因此,在他的书画、篆刻作品中既有仿效《石鼓文》的明显痕迹,给人一种醇古、泼辣的金石气,同时,又能融会贯通开篆书一代风格。晚年吴昌硕取法石鼓文更是炉火纯青,以篆隶作狂草,别有自家风格(图1-10)。吴昌硕在书法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其自身天赋的因素,当然,更离不开对古代碑帖的取法与借鉴。

借此,也使我们今天学习、研究碑帖知识显得更有意义。



▲ 图1-9 战国《石鼓文》拓本局部

吴昌硕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生,民国十六年十一月(1927年)卒。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等。浙江湖州安吉人。吴昌硕与虚谷、蒲华、任伯年齐名为“清末海派四杰”,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光绪八年(1882)定居苏州,后来又移居上海。阅历代大量金石碑版、玺印、字画,眼界大开;广收博取,诗、书、画、印并进。晚年风格突出,篆刻、书法、绘画三艺精绝,声名大振,公推艺坛泰斗,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吴昌硕的绘画、书法、篆刻作品集有《吴昌硕画集》、《吴昌硕作品集》、《苦铁碎金》、《缶庐近墨》、《吴苍石印谱》、《缶庐印存》等,诗有《缶庐集》。其有三子一女,次子吴涵、三子吴东迈均善篆刻书画。